

# 张元济赴日访书与民族记忆的修复

周武

**摘要** 1928年张元济赴日本访书前后历时一个半月之久，其间他遍访东京、京都等地公私藏家，寓目珍籍之多，借影过程之复杂，成功商借数目之大，史所罕见，堪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华章。有关张元济此次日本访书，已有论述大多依据郑贞文的回忆文章，认为张元济回国时已携回46种珍本秘籍的摄影底片。事实上，张元济回国时借影远没有完成，甚至连拟借影的书目清单也是回上海后才最后确定的，并在具体的借影过程中不断有所调整，实际的借影交涉极其复杂、艰难。但由于行前准备充分，又有熟悉日本公私收藏的马宗荣全程陪同，并负责接洽借影有关古籍事宜，同时还得到日本汉学家诸桥辙次、长泽规矩也、内藤湖南等一大批日本友人协助，此次访书收获巨大，总共成功借影了61种珍稀古籍，其中大多是“中土久佚之书”。这些珍本秘籍后来相继被编入他主持编纂的大型古籍丛书，使沈蕴数百年之久、离散于异域的古本逸编得以复见于故土，并重新楔入中华民族的历史与记忆。因此，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版本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民族记忆的修复和民族精神的再构。

**关键词** 张元济 日本访书 文化记忆

作者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235）。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8)06-0146-20

1928年10月15日，张元济以中华学艺社名誉社员名义，由郑贞文陪同，从上海启程赴日本访书，12月1日从长崎乘船回国，前后历时一个半月之久。其间他遍访东京、京都等地公私藏家，寓目珍籍之多，商借数目之大，借影过程之复杂，所获之丰，史所罕见，堪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华章。有关张元济此次访书，历来颇受学界关注，<sup>①</sup>但由于史料所限，已有论述并不足以反映此次访书的全过程，其中还存在一些明显的讹误。近年来，随着一些相关关键资料陆续公布，此次访书的原委始末始有浮出水面的可能。<sup>②</sup>本文即以这些新公布的关键史料为依据，并参酌其他相关史料，力求还原出张元济此次访书始末及随后的借影交涉过程，进而探讨其多重意义。

① 有关讨论，王绍曾的《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增订本）、叶宋曼瑛的《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张树年主编的《张元济年谱》、吴方的《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等张元济传记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论述，相关的论文也有一些，较具代表性的有陈东辉的《张元济与中日文化交流》（《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王国忠的《中日出版交流史上的华章——张元济日本访书述评》（《出版与印刷》1994年第2期）等。

② 这些关键史料主要包括张元济哲嗣张树年家藏的由张元济辑并装订的《马继华君来往信件（日本借书事）》稿本1册和上海市档案馆藏张元济与国内外文化界人士通函3卷，档号Q459-1-155、156、157。前者经张元济哲嗣张人凤整理后编入《张元济全集》第1卷，2007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者经上海档案馆学者陈正卿、李佳燕、彭晓亮整理后，按原卷分3期连载刊布于上海市档案馆编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3辑（2007年8月出版）、第5辑（2008年11月出版）和第6辑（2009年3月出版）。

## 一、广求善本与日本访书

张元济是近代中国有数的版本目录学大师，<sup>①</sup>先后为商务印书馆主持编校、影印的古籍丛刊多达四十余种，其中用力最劬、费时最久、成绩最大、且最为学界称道者，厥为《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他主张“书贵初刻”，为了编纂、辑校和影印这些大型古籍丛刊，“为古人续命”，张元济竭尽所能地在海内外广求“初刻”和善本。1928年赴日访书，就是他广求“初刻”和善本的一种努力。

自道咸以降，“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庚子国变后，趋新已成举国滔滔之势，“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界、绅士以及商人在内的人士，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式教育的人几乎不见了”。<sup>②</sup>与之对应，旧学、旧籍则受到空前的冷遇和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日趋而日益负面化和边缘化。身处这样一个时代，识者每以为忧，他们“慨然于旧书之将绝”，视旧籍沦亡为“划灭文明”，大声疾呼抢救古籍、保存国粹，旧籍沦亡遂激成一场颇具声势的古籍抢救运动。作为一个“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张元济更自觉地将“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引为己责，努力以赴。然而，保存与传播古籍，“愿祝化身千百亿”，又必须以搜罗足够数量的珍本善本古籍为前提。张元济虽有商务的财力作后盾，有蔡元培、缪荃孙、傅增湘等知己朋友鼎力襄助，但广求善本的过程仍然是非常艰辛的。他曾用“丐之藏家，求之坊肆，近走两京，远驰域外”十六字来概述自己网罗善本苦乐兼具的历程。<sup>③</sup>“丐之藏家”，指的是直接从藏书家手中成批收购。与“丐之藏家”相比，“求之坊肆”只能算是零星的搜罗。至于“近走两京”，那是指他搜罗范围之广，并不限于通都大邑。“远驰域外”即指1928年赴日访书事。

赴日访书，当然是因为日本保存有大量的中国古籍，其中不乏中土失传的珍本。自日本遣使入唐始，中日官方和民间文化交往不断，大批中国古籍被舶载而东，为日本公私藏家收藏，并得到妥善保存。<sup>④</sup>迨至清末民初，神州板荡、“新学猖狂”，海内藏家或亡或散，率多不守。海外，特别是日本藏家遂乘势而入，大举购藏，且多整部收藏，其中尤以购藏皕宋楼和莫理循文库最受瞩目<sup>⑤</sup>，前者归静嘉堂文库，后者入东洋文库，成为镇库之宝。1924年静嘉堂文库迁新馆，并公布其藏书详细书目。张元济披览之余，发现这家私人图书馆竟藏有9000余种中国善本古籍，比清朝御订《四库全书》还多出5000卷。更让他吃惊的是，其中竟有177卷是早已在中土失传的著作，《四库全书》亦仅列出书目而没有正文。对静嘉堂文库的藏书质量，张元济早就有所了解，但竟藏有如此众多的善本古籍还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当时他正在酝酿《四部丛刊》换版和续编选目及《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印，1926年退休后，更将精力和时间集中到古籍抢救、整理与影印上来。张元济当然想尽早东渡日本，查访并设法借影那里度藏的珍本秘籍，尤其是静嘉堂文库入藏的皕宋楼藏书，俾使他为商务印书馆主持的大型古籍丛刊影印更臻美善。

促使张元济下决心赴日访书，可能跟日本汉学界对《四部丛刊》底本选择的关注与指摘亦不无关系。《四部丛刊》“预定书目”厘定后，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及武内彦雄即在《支那学》上发表评论，神田喜一郎所作《论〈四部丛刊〉之选择底本》一文直指《四部丛刊》中一些底本“采用之失”，文中写道：

《四部丛刊》之刊行，实为有裨学界之壮举。吾辈学生，无不同感此福音。今读其预定书目，大旨合于出版之主旨。四部中重要书籍，已网罗俱尽。其选择底本，亦尚为适当。虽然，论吾辈得陇望蜀之愿，则

① 张元济本人一向拗谦逾恒，独对自己在版本目录学上的造诣极自信，曾对王云五说：“余平素对版本学不愿以第二人居，兹以远离善本图书荟萃之故都，或不免稍逊于傅沅叔（增湘）矣。”参见王云五：《涉园序跋集录》跋，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80页。

② 徐雪筠等编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64页。

③ 张元济：《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序》，《张元济诗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1页。

④ 有关中国典籍流播日本的研究论著甚多，较具代表性的成果有日本学者大庭修的《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的研究》和中国学者严绍璎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等，前者系统地论述了江户时代的汉籍输入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后者则全面地考察了汉籍东传日本的历史及其流布的概况。此外，陆坚、王勇主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及（王勇、大庭修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亦有可观。

⑤ 有关皕宋楼售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前后经过，可参见顾志兴：《湖州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之考索与建议》，《浙江学刊》1996年第3期；莫里循藏书售与日本的相关情况，参见周振鹤：《从莫里循文库到东洋文库》，《读书》1994年第7期。

如此巨构，于底本之选择，尤宜格外注意。如《群书治要》不用日本元和二年刊本，而用有显然臆改形迹之天明七年尾州藩刊本，注意似犹未周。《弘明集》《广弘明集》之用明汪道昆本，《法苑珠林》之用明径山寺本，稍稍近似，实则当用高丽藏本。《世说新语》用明嘉趣堂本，亦未为美善，是应用日本图书馆之南宋本或其翻刻之官版本。《杨诚斋集》为缪氏艺风堂影宋写本，想由日本图书馆所有之宋端平本刊本影写而来，亦不如直用端平本之为愈。《古文苑》用二十一卷本，亦为非宜。想因有章樵注故，然不如用孙巨源原本之九卷为佳。又未确定之底本中，如《春秋经传集解》之拟用翻宋本，实不及日本图书馆宋嘉定丙子闻人模刊本。《大唐西域记》拟用明刊本，不及日本京都文科大学丛书本。《荀子》拟用明世德堂本，不知何因。与其用此，宁用《古逸丛书》之宋台州本。《范德机诗集》拟用明刊本，则用日本延文辛丑刊本为较佳。以上云云，因见预定书目，思想偶及，聊复饶舌。幸此书尚须经一两年始成，窃愿于此等处慎思熟审，俾成一完美之大丛书。吾辈认此书为中国最有价值之空前巨著以介绍于读者，并略述区区之愿望，盼其克底于成也。<sup>①</sup>

神田一口气举出《四部丛刊》“预定书目”中11种底本“未为美善”，而他建议用以替换之本多为日本所藏，叶德辉认为，神田的指摘“甚中窳窍”。相比之下，武内彦雄的批评要委婉一些，他在题为“谈《四部丛刊》”的评论中指出：

清藏书家以吴县黄丕烈为第一。黄氏之书，后移于汪士钟之艺芸精舍。汪没，归常熟瞿子雍、聊城杨绍和。晚近则陆心源之丽宋楼、丁丙之八千卷楼，两家藏书称与瞿、杨相颉颃。《四部丛刊》中收采尤多之江南图书馆藏书，即八千卷楼之物，而铁琴铜剑楼亦多精本，故瞿、丁两家之尤者，大多网罗其中。惟杨氏之书则一不入选，陆氏旧本惟拟翻印一种，斯为憾事。闻杨氏主人耽阿芙蓉，颇斥卖家珍充其嗜欲。其母严扁，不令与人接。陆氏书售诸吾国岩崎氏殆尽。因是不得，理或然欤？是则得瞿、丁两家之影本，亦不可谓非幸福。而况艺风堂、观古堂之书，傅增湘、刘承幹有名之秘本，均得借此书以见之，尤为无上之眼福也。<sup>②</sup>

文中说“惟杨氏之书则一不入选，陆氏旧本惟拟翻印一种，斯为憾事”，其实，张元济又何尝不想多收采“杨氏之书”和“陆氏旧本”，只是海源阁尚不得其门而入，韶宋楼则已归日本岩崎氏。叶德辉说：他曾就此事“屡与菊生商之，劝其不惜巨费，以成完美。而主者吝惜印费，迁就成书”。<sup>③</sup>但对张元济而言，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影印《四部丛刊》本来就是耗资巨大的工程，馆内意见并不一致，要“不惜巨费，以成完美”，谈何容易！所幸，《四部丛刊》出版后大获成功，既保存了国粹，又为商务开拓了“新营业”。这就为《四部丛刊》换版及其他后续影印计划实施创造了条件。张元济赴日访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得以实现的，亦可视为弥憾之举。

此次访书得以成行，则全赖中华学艺社居间努力。中华学艺社前身丙辰学社，系留日学生于1916年在东京创设的学术团体，1918年该社绝大多数社员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军事协定》而辍学归国，社务停顿。1920年该社在北京及上海的社友打算复兴社务，此举得到张元济、高梦旦等人鼎力相助。1922年12月起，丙辰学社正式更名为中华学艺社。学艺社刊物《学艺杂志》以及学艺社同人编写的各种书籍多由商务排印发行，学艺社骨干如郑贞文、周昌寿、杨端六、何公敢、江铁、林植夫（原名驎）等也都先后被聘为商务编译所编辑，双方合作无间。学艺社东京分社干事马宗荣（继华）在东京帝国大学研究图书馆学，“知道日本公私立各图书馆藏有宋、元、明、清中国精版图书甚多，建议由学艺社向日本各藏书家选借，作为《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的整套内部刊物出版，仅分配于特别需要的社员，不对外发售。这原是日本学术团体常用的办法，可以援例举办”。<sup>④</sup>这个方案经上海总社干事会议通过后，得到张元济和高梦旦的赞同，商务负责提供选书影印的经费，郑贞文和马宗荣则代表学艺社向日本公私图书馆及藏书家交涉借印手续，约明书籍印出后，每种分别赠送原书所有者各二十部。日本内阁文库、东京图书馆、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等咸表赞成，此事遂按约进行。

①②③ 转引自叶德辉撰：《书林余话》卷下，《书林清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9—280、281—282、279页。

④ 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10页。

中华学艺社虽迁回上海，但与日本学界一直保持密切联系。1925年11月，日本学术协会召开第一届年会，学艺社即派出一个16人的学术视察团前去参加，以后历次会议，中华学艺社皆派团出席。日本学者访问中国时，也常到中华学艺社与社友交流。1928年10月15日，中华学艺社组成第五次学术视察团赴日本出席日本学术协会第四届大会，张元济即以该社名誉社员名义偕同郑贞文等人乘“上海丸”轮赴日访书。由于行前准备充分，又有熟悉日本公私收藏的马宗荣全程陪同，并负责接洽借影有关古籍事宜，同时还得到包括内藤湖南、诸桥辙次、长泽规矩也在内的众多日本友人协助，张元济访书之行极为顺利。在此后的短短一个半月里，张元济马不停蹄地往访于京都、东京各公私藏书机构之间，恣意饱览静嘉堂文库、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洋文库、帝国大学图书馆及京都东福寺藏书楼等各家所藏，见到不少早已“绝迹于中土”的孤本秘籍，初步确定了拟借影的珍稀书目，为随后的借影交涉提供了重要依据。曾跟随张元济一起访书的郑贞文后来回忆道：

此次东渡访书，张元济事前搜集资料，作了大半年的准备，旅行、摄影等用了十多万元的经费。三个多月间，除星期日外每日不息地阅读古书，我和张共同起居，见他每晚必作笔记至于深夜，其忘我奋发的精神，实堪佩服。他此行不仅能看到多年渴望的“硕果楼”藏书，并能遍览久佚在日本的珍版秘笈。当我们将古籍的摄影底片满载归国时，他那怡然欣慰的神情，至今还使我们无限感奋。<sup>①</sup>

这段回忆有两处误记：一是张元济此次赴日访书仅一个半月，而非“三个多月”；二是借影过程极为复杂，他们归国时远未完成，不可能“将古籍的摄影底片满载归国”。但说张元济访书期间“忘我奋发”及归国时的“怡然欣慰”，却非常传神。扶桑归来，张元济仍兴奋逾恒。他在12月4日写给瞿启甲的一封信中写道：

弟在日本勾留一月有半，参观公私各图书馆，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承假抄本《北石闲诗集》，彼土乃有宋刊。《平斋文集》《黄文献集》，均有宋元足本可以补全，殊为快事。<sup>②</sup>

不仅如此，他还诗兴大发，赋长歌一首，书赠静嘉堂岩崎男爵，兼示冈部长景、服部宇之吉、安井小太郎、德育猪一郎、姊崎正治、宇野哲人、盐谷温、中村久四郎、久保得三、诸桥辙次、石田干之助、滑川达、内野五郎三、永山近彰、长泽规矩也、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长尾楨太郎、神田喜一郎诸君子并斯文会会员，借答日本友人赞襄协助雅谊，其辞曰：

昔闻海上三神山，仙人之居不可攀。卿云轮囷满霄汉，乃知福地兼婣嬛。中原文物万方布，大师巡礼竞西渡。蓬莱清浅时往还，携归经籍纷无数。唐宋阅今千百年，流风未息薪火传。海通地缩旦夕至，书城舶载尤便便。我生不辰厄阳九，抱残守阙尝恐后。只怜百宋与千元，塵架萧条渐乌有。吴兴观察兴独豪，南北搜讨不辞劳。带经宜稼尽销歇，层楼丽宋瞻天高。守先岂无克家子，世事沧桑非得已。遗书珍重方凿楹，韞玉求沽旋入市。故人闻讯喜开颜，愚公有志思移山。祖生一鞭先我著，海涛东去不复还。静嘉主人长袖舞，耽玩经史争快睹。挥斥黄金无吝容，万卷归来埒天府。东京学术之中枢，兰台延阁无处无。主人意是犹未嫌，更辟文库饷师儒。我闻此举深太息，廿年宿愿偿未得。破万里浪乘长风，好探珍秘开茅塞。风驰电掣原野阔，山光掩映溪声长。溪山深处乐游苑，旧朋握手喜相见。指公遗像陈堂前，恨我迟来艰覿面。墓门佳气郁葱葱，百城长傍泉台宫。生前爱玩不忍释，英灵呵护长无穷。令子象贤称主器，大启堂构继先志。金匱石室严弄藏，精架名钞广罗致。我来海外交有神，特许巡览娱远宾。执事靖共骏奔走，相助检索逾兼旬。好书不厌百回读，快事生平夸眼福。既入宝山宁空回，得陇何嫌更望蜀。是邦朝野多名士，同声相应未遐弃。仰体前贤求法心，俯酬远客东来意。公私典籍同秘藏，门墙数仞徒旁皇。片言相介重九鼎，遍窥邳架并曹仓。官寮美富首屈指，内阁精华差可拟。足利遗迹亘千秋，五经纷纷叹观止。尊经世说古本孤，成策鲁论美且都。更有宛陵留半集，诗老长怀梅圣俞。独惜祝融淫虐肆，太学烬余闭篋笥。摩挲手泽留东洋，目盲未识蟹行字。二三俊贤栖京洛，补亡缉遗殊不弱。三辅图籍雄关中，归途定访石渠阁。寒家世泽传清河，横浦遗集今不磨。等身著作云烟散，什无一二堪搜罗。宦游所至亟访古，数典自惭竟忘

① 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17页。

② 张元济：《致瞿启甲》，《张元济全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22页。

祖。忽闻员峤方壶间，乃有陈编在东土。逸书百篇今尚存，将伯请诵前人言。良朋意气重然诺，许我探索不惮烦。回首乡关尚烽火，礼失求野计未左。国闻家乘亡复存，感此嘉惠非琐琐。呜呼！世界学说趋鼎新，天意宁忍丧斯文。遗经在抱匹夫责，焚坑奚畏无道秦。当世同文仅兄弟，区区阅墙只细事。安得尔我比户陈诗书，销尽大地干戈不祥气。<sup>①</sup>

这首答谢日本友人的诗篇，既是张元济日本访书记事，也可以说是一篇中日书籍交流简史。诗中洋溢着廿年宿愿得偿的欣悦，盛赞日本公私藏家弃藏之美富，更寄望于中日友好，至今读来犹感人至深。张元济并不以诗歌见长，留下的诗歌也不多，但在日本访书期间，却常以诗遣怀，以歌咏言，写下了不少诗篇，仅据《张元济诗文》所载就有九首之多，其中尤以这首长歌最具代表性，从中不难窥见他日本访书之旅的百感交集。

## 二、借影交涉：过程、收获与“雅谊”

有关张元济此次日本访书，已有论述大多依据郑贞文的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认为张元济回国时携回了从日本公私藏书机构借影的46种珍本秘籍的摄影底片，“经商务印书馆照相部修整扩大后，作为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陆续出版，除分别赠送原书所有者各二十册外，余交学艺社总分社及少数社员保存，作为内部刊物”。<sup>②</sup>其实，张元济回国时借影远没有完成，甚至连拟借影的书目清单也是他们回上海后才最后确定的，并在具体的借影过程中不断有所调整，实际的借影交涉也比预想要复杂、艰难得多。

张元济和郑贞文是12月1日从长崎乘船回国的，在离开日本之前，张元济就已将借影事宜委托给马宗荣，由他具体负责筹画接洽。因此，张元济常在一些私人信函中称马宗荣为“敝处驻东京代表”。还在长崎候船回国期间，即11月30日，张元济即曾致信马宗荣，信中说：“西京照书事，拟到上海后将借影西京各家旧书一并筹画妥帖，再函达。”信中还提示，借照静嘉堂5种，内有《饮膳正要》一种，不甚重要，拟请从缓。“《武经七书》原定用八折片。昨与郑心翁（郑贞文，字心南）商，拟改依原书尺寸摄影。弟意四折片容积当有余，万一原书尺寸大于四折片，则请将该书尺寸用英寸量明内框纵横若干尺寸，明白开示，以便再行决定”。<sup>③</sup>《饮膳正要》和《武经七书》都是拟从静嘉堂文库借影的书目，在张元济回国前根本没有开始摄影，更谈不上携回底片了。12月8日，马宗荣致函张元济和郑贞文，汇报借影各书进展情况，信中写道：

静嘉堂之书已遵命，嘱户塚氏先照《清明集》《群经音辨》，次及《陈书》。《武经七书》之原版尺寸已托长泽氏到静嘉堂代测。

图书寮之书，帝大图书馆开馆之日杉寮长亦到，杉氏谓可由彼先与国内大臣办一次内交涉，再提出愿书，以便一提出便能批准，两方面子上较为光荣，因其中（书单之中）之书有文化事业部拟印者与该寮拟印者在，此类之书能许重照否，当视宫内大臣意见如何故也。

东福寺之书，既寻着《中庸说》一册，仍以由荻野氏取到东京照相为便，抑可由该寺直借与我等为便？待告。

山本氏交涉之内阁文库事，日前已去一函询问，至今尚无回信。

诸桥氏谓照静嘉之书时，请继续拍照，以便早告结束。

户塚氏目下甚忙，故拍照开始，须在十日以后也。<sup>④</sup>

张元济回上海后，时刻关注马宗荣借影交涉的进展，并随时提出要求。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借书事，张元济、郑贞文与马宗荣之间，可谓函电交驰。后来张元济曾亲自将这批珍贵的往来函电打印稿装订成《马继华君来往信件（日本借书事）》稿本。可惜的是，这个稿本现在仅存第一册，起自1928年11

① 张元济：《东瀛访书记事诗》，《张元济全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4—25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张元济诗文》，此诗题作“戊辰暮秋至日本东京观静嘉堂藏书，赠岩崎男爵等”，见该书第9页。

② 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15页。

③④ 《张元济全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72页。

月30日，迄于1929年4月4日，以下各册均佚。这仅存的第一册，经张元济哲嗣张人凤先生整理后，刊于2007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全集》第1卷第172—188页。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中日书籍交流史料。下面即根据这一份史料，并参考其他相关资料，尽可能详尽地再现马宗荣代张元济向日本公私藏书机构办理借影交涉的复杂过程，并借以说明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古籍影印工程对日本藏书的借重。

尽管张元济“公私冗积，忙不可言”，但他最关切的还是向日本公私藏书机构借影事宜。同年12月14日，张元济致书马宗荣，详细询问各处借书及摄影情形，其中写道：

公私冗积，忙不可言，致各处拟借影之书此时尚未能决定。兹有致山本君一信，附呈台阁。不知我兄与长泽先生于弟等行后曾晤见山本君否？图书寮、内阁文库及足利遗迹图书馆借书事不知有眉目否？如尚无眉目，拟请移驾与山本君一商，前信即同时交去……静嘉堂书未知已否开照？中有补照《金华黄先生文集》十二卷，需用甚急，能急着手先照，尤为禱感。

信末并开呈《金华黄先生文集》补照各卷系卷21，卷33—43。信中提到的“致山本君一信”，系询借大连图书馆小说戏曲书事。此信一口气向马宗荣询问了三个问题，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其中除了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是郑贞文回忆文章曾提及的借影机构外，还有足利遗迹图书馆。可见张元济拟借影的书目，并不限于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洋文库及静嘉堂四家。12月15日，张元济复函马宗荣，将所询各事奉答于下：

图书寮拟借之书前阁下所见者，不过偶然记录，尚未完全。阁下已交与杉寮长，此时尚拟加入数种，另开一单附上。其中《三国志》一种最为需要。其次则为《论语注疏》及补配《北碕文集》之第九、十卷（并外集一册）、《本草衍义》之第一、二、三、四、五卷。又宋代黄善夫《史记》，如有可以补配之卷，亦甚需要。以上各书务祈设法商妥，并恳长泽先生相助。其余各书如能均借固妙，如不允亦无法。

东福寺之书，寺僧业已允照。为数不过数十页。户塚氏现亟需照静嘉堂书，事毕再往恐日久变卦。拟托长尾雨山就近先照。

静嘉堂之书已选定五种，尚有五种须稍迟数日方能决定。借照之书必定继续照相，决不中断。前拟借照《金华黄先生文集》九卷不在十种内，已得诸桥先生允许。兹再拟补照十一页。又《愧郟录》及《陈古灵先生文集》亦各拟补照数张，此颇琐屑，如有为难尽可作罢。

又《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两书卷帙甚多，约共得一万二千七百叶。如欲借照，不知诸桥先生以为我过于贪多、过于久长，有所烦厌否。祈便中探听。如觉不宜，则祇借《册府元龟》一种，而以《太平御览》一种改向图书寮乞借。统祈核办。

此信系对马宗荣12月8日致张元济、郑贞文函的回复，信中提到拟补照的许多书，如宋黄善夫刊本《史记》《金华黄先生文集》《愧郟录》及《陈古灵先生文集》等都是郑贞文回忆文章中不曾列入的。这再次说明，张元济拟向日本借影的书目是回到上海后仔细查核国内收藏之后，再不断补充修订的。信中张元济还附上了“拟借影帝室图书寮之书”书单，其中除了原拟借影的《论语注疏》（宋刊）、《三国志》（宋刊）、《三谷外集》（元刊）、《本草衍义》（宋刊）、《北碕文集》、《北碕外集》（宋刊）等外，又加入数种，包括《论衡》（宋刊）、《集韵》（宋刊）、《北碕文集》（宋刊）、《世说新语》（宋刊），以及希望补配、补照的数种含宋黄善夫刊本《史记》、宋刊《愧郟录》、宋刊《陈古灵先生文集》和《金华黄先生文集》，书单中还详细地列出拟向图书寮商借各书需要补配、补照的具体缺卷和缺页（叶）。

说到宋刊《愧郟录》，有一段故事值得在这里说一。当时张元济正在筹划《四部丛刊》续编，拟收入《愧郟录》。但他发现国内藏本均缺而不全。其中卷一，缺第七、第八、十五、十六计四页；卷五，缺第九、十、十一、十二，计四页；卷七，缺第五、第六，计二页。共计缺十页书。他原本希望在静嘉堂能从陆氏所宋楼旧藏中找到这些缺叶。可静嘉堂陆氏旧藏《愧郟录》，同样也缺此十叶。因此，他请马宗荣从帝室图书寮商借补照。1930年春，张元济得知周越然在上海以重价购得一部《愧郟录》，便急前往观看。发现此本系祁氏澹生堂徐苑本，系明人写本，有澹翁手跋，且有毛子晋、季沧苇、朱锡鬯等印记。可惜只存首七卷，是个残本。但各种刊本所缺的那十页，竟在这个残本中“宛然具在”。1934年1月，张元济在为该书所作跋文中叙其事道：“友人周君越然购得祁氏澹生堂抄本半部，余闻之往假，开卷则此十叶者宛然具在。因遂录之。请人依原书款式写补各叶，前后适相衔接。虽卷五之第九至十二叶，仍有阙文，是本卷二‘淳熙南衙’

一则阙七字，卷四‘鱼袋’一则阙八字，卷六‘仙释异教之禁’一则共阙七字，祁本亦无可补。然大致要已具足。明清鼎革，忠敏遭难，藏书散尽，世极罕见。阅三百年于有人复印之时，而是书忽出，且亡其半，而有此十叶之半部独不亡，不可谓非异事矣。书此以识吾友通假之惠，并为是书庆幸焉。”<sup>①</sup>对此，周越然亦同样兴奋不已。1942年9月2日，他在《古书一叶》一文的文末特别谈及此事，他说：“宋岳珂《愧郗录》十五卷，吴县黄氏，常熟瞿氏，吴兴陆氏，皆藏有宋本。黄陆二氏之书早已散去，在人间与否不可知。瞿氏之书尚为其后人所守。查尧圃藏书题识卷五，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卷十六，仪顾堂集卷二十，知三氏之书，行格相同（半叶九行，行十七字），而缺叶之数（共计十叶）亦复相合，——是三书同出一源也。宋以后重雕之本，有明岳氏校刻本，学海类编本，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鲍氏之书，行格一遵宋刊，校订精详，实为各书之冠，惟其缺叶与宋明清各本均同。岂世间竟无完本耶？民国十九年之春，余以重价购得此本于申江，即所谓祁氏淡生堂餘苑本也，有澹翁手跋，且有毛子晋，季沧苇，朱锡鬯等图记，系明人写本。惜只存首七卷，不得称为完璧。幸各本缺文均在此七卷，后来商务印书馆编印《四部丛刊》续编，即借以校补，亦一大快事也。”<sup>②</sup>张元济觅得《愧郗录》的缺叶，并编入《四部丛刊》续编，而静嘉堂藏本亦有相同的缺叶，因此张元济特别将所缺十叶的影写件赠给静嘉堂文库，俾成完璧。静嘉堂文库获此珍宝，即原封不动地贴到该书空白书页上。1992年出版的《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上对《愧郗录》所补缺十叶，特意注明“由张菊生先生提供”。<sup>③</sup>这个插曲，可以说是中日书籍交流史上一段美谈。

接到张元济的回复后，马宗荣并没有马上作答，原因有二：一是张元济所询诸事尚无眉目，二是他本人正忙于毕业论文写作，故延至1929年1月3日才得以从容作复，详告借影《武经七书》《愧郗集》《金华黄先生文集》《册府元龟》《本草衍义》等书情况，以及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等处借书进度。其中，“图书寮之书，只办到向杉寮长作内交涉，而由杉氏向宫内大臣作内交涉之工作。社中来信已由长泽氏交与杉氏。该信只能用作与杉氏个人之用，将来当由弟另作正式愿书与宫内大臣也（自然系用社中名义）。至其限制若何，容后得悉后再详”。“内阁文库之书，山本已有回信，称已有前例，可以允许，且嘱提出正式愿书，故前发一电与心南兄。后社中公函来后，即持往访山本氏，惜山本氏已往他处旅行，故尚未得结果。俟山本氏归来后即当再往交涉，询其提出手续及方式，迅速办妥也。社中寄交公函，亦只能作与山本氏个人之用，将来当由弟作一正式愿书与内阁也。（用社名义）。”“足利文库之书及大连图书馆之小说等事，山本氏寄与弟函，未提及，恐另有函与菊生先生也。俟晤着山本氏当面询之。”“静嘉堂修缮书籍工人一事，目下岩崎氏未在东，能否加价雇之，不得而知。以后如欲聘请，诸桥氏当另函托菊生先生。此事因诸桥氏嘱弟转达菊生先生，故及之。”另外，诸桥氏还特别提到，“将来社中作序文或广告时，若述及静嘉堂事，请先将原稿给彼一阅，恐引起误解也（原因若何，不得而知，但闻诸该馆中人云：国人欲向该馆借照者甚多，其他均被拒绝云）。”<sup>④</sup>从马宗荣汇报的借影交涉过程可知，以中华学艺社名义向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等处借书，均需出示学社出具的公函。另外，内阁文库借书，还需要一份张元济的履历。因此，在正式办理交涉之前，马宗荣曾于12月22日，致电张元济，“图书寮公函速寄”。12月24日，由郑贞文复函并寄去向图书寮及内阁文库借书公函，并请会商山本、服部、冈部、宇野等人帮助。<sup>⑤</sup>当然，并不是所有借影之书皆以学艺社名义商借，也有以张元济个人名义或张元济代商务印书馆商借的，如拟向静嘉堂借影补配的《愧郗录》《陈古灵先生集》和《金华黄先生文集》即是。不过，如出现这种情况，张元济一般会在相关信函中作特别说明。张元济在1929年1月11日致马宗荣书中即陈明：“《愧郗录》《陈古灵先生集》均由商务印书馆在国内借得宋本照出，惟仅有缺叶数张，弟记得静嘉堂藏本可以配补。此书系弟代商务印书馆乞借。此两书将来不能用学艺社名出版。前请借补《金华黄先生文集》九卷，曾声明用弟个人名义乞借。今此两书

① 张人凤编：《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04页。

② 周越然：《书与回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8—19页。

③ 张建智：《宋版〈愧郗录〉与张元济——静嘉堂读书札记之五》，《文汇报》2007年9月28日。

④ 《张元济全集》第1卷，第175—176页。

⑤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14页。

仅系补配残叶，拟仍援例办理。请代向诸桥先生陈明。如觉为难，不妨作罢。”<sup>①</sup>

张元济办事一贯认真严谨，在与马宗荣的往返书信中，张元济除了随时提出补配、照影各书要求外，听说静嘉堂借与照相之房屋系诸桥氏的馆长室，他在1月11日写给马宗荣的信中称：“接诵来示，始知诸桥先生将馆长室借与我处照书，闻之甚为不安。”因此，他请马宗荣与诸桥先生商借文库左右旷地，搭建临时板屋，作为照书之室，“免致久占馆长所用之室，似于交际礼意上应当如此”。<sup>②</sup>当然，他与马宗荣的往来函电中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还是急切地询问向图书寮、内阁文库等处借书进展是否“已得正式许可”，并按要求寄上两处所要学艺社出版物。马宗荣自然亦心领神会，每函必详细禀报。1月18日，马宗荣致书张元济、郑贞文，就特别谈到他与内阁文库等处交涉借影的详情：

山本氏昨日覆来一函，嘱弟今日到满铁支社向神鞭理事接头一切。弟如约而往。神鞭氏遂以电话介绍弟往谒内阁文库之樋口氏。樋口氏为弟曾晤面过之友人，遂接受社中寄来之信书而嘱弟速补寄社中出版目录及社章与之，彼即代弟作一详细报告，附入社中寄来之信，呈与鸠山氏，请其正式许可。弟已开具社中出版书目（此次已得借主许可之图书，亦作近刊书加入，因非加入不可故也）寄去。社中如无其他困难，可寄社中出版图书全部各二份来东为荷，因内开文库与图书寮有要求出版物之故耳。

大连图书馆之书可直函大连满铁本社交涉，山本氏已有函去矣。（最好俟此信到沪后一礼拜后，再发信到大连为佳。）

足利文库尚未交涉妥当，容后再陈。<sup>③</sup>

借影交涉不易，譬如张元济原本希望向静嘉堂借影《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但静嘉堂仅允诺借影《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则不能如愿”<sup>④</sup>。就是各处允借之书，摄照过程亦有种种麻烦：有的书因折口已破，不能全页展开，如《黄学士文集》（应即《金华黄先生文集》）；有的书因每页内均有垫纸，不能展开照相，如《欧阳公本末诗集》；有的原书高处过低，而横处过长，高处能合契约所规定之寸法，则长处过长，而不便装订，如《陈书》，等等；而摄照需按事先商定的规格和尺寸进行，难度极大。这种种麻烦都影响到摄照的进度，所谓“需多费时间，而完结较迟”<sup>⑤</sup>。

为了使借影交涉更加顺利，郑贞文还曾代表学艺社分别致函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和日本内大臣秘书长（内定）岡部长景，并请马宗荣持书前往交涉。马宗荣遵命照办，并于1月30日致函张元济和郑贞文，“述其始末”：

1. 至外务省，因岡部氏内定转充内大臣秘书长职，故由岩村氏代见。岩村氏谓图书寮之书，日前得遇杉氏，已略谈及。大约一部分因已允借他人，碍难重允借与我等；其他一部分俟与宫内大臣妥商后即可答复。其言与荣前函所云者相同。最后，彼谓二月初间，彼能遇见杉氏，届时定当面再催，似较去信催促有力。内阁之事，岩村氏谓提出愿书时非以鸠山氏为主不可，而催促进行则不能向鸠山氏交涉，因彼官大事繁，且目下议会攻击彼党甚力，难顾及此小事。彼当与岡部氏一商，用其他方法进行。岩村氏谓要之，总当代设法，使我等目的早能达到。

2. 至公使馆访汪氏，详述经过情形，最后总括所述，请求汪公使代为帮忙四事：（1）催促内阁文库早日批准；（2）催促图书寮早日覆函；（3）若汪公使前与图书寮商借影印出版（文化事业费）之图书目录中有《太平御览》一书，请将该书让与我等出版，因由我等出版，比较的能配成全部也；（4）若内阁文库批准后，请代说项，希能借得《册府元龟》到手。最后结果，汪公使对荣所请求四事，均慨然允诺。是日也，汪公使适有事到外务省，伯韩亦同往。后闻之伯韩云，汪公使曾向岡部氏提及《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二书之事，云云。不过汪公使曾对荣云，彼与现内阁十分不对，与杉氏亦无十分多情。非推委也，实情如此，却是写一封信去，自然无可的，云云。故据荣所见，托汪公使说项一层，难有多大效果。岡部氏方面，料能生效。今日伯韩得遇岡部氏，彼曾对伯韩云及荣因某事访彼云云，可见渠甚关心也。

3. 至于万一政变，内阁文库方面当受影响。不过既有前例在先，苟荣仍在江户，当能设法从新交涉。

① 《张元济全集》第1卷，第177页。

②③ 《张元济全集》第1卷，第176—177、178页。

④⑤ 马宗荣：《致张元济、郑贞文函》，《张元济全集》第1卷，第175、179页。

图书寮方面则不至受丝毫影响。<sup>①</sup>

由郑贞文分别致函汪荣宝和岡部长景，请他们出面协调交涉，表明马宗荣与图书寮和内阁文库的借书交涉并不尽如人意，而汪公使和岡部氏愿意居间赞襄协助，乐见其成，故又仍有成事的希望。

借影交涉的繁难，是张元济、郑贞文等人先前没有预料到的。张元济于2月5日回复马宗荣说：“图书寮、内阁文库两处借书如此繁难，然看来不致无望。此事全赖吾兄大力。岡部既肯为力，或者更能顺利。图书寮所借之书最要者为宋本《三国志》，此书务求设法借到。千万千万。”<sup>②</sup>因为繁难，所以听到借影“可望有成”，便“极为欣慰”。2月15日，他在条复马宗荣的一封信中写道：“图书寮之书承示离日以前尽力交涉，以期有成，尤为衔感。其中以宋刊《三国志》一种最为需要。长泽君二月二日致郑心翁（贞文）信谓，《论语》《世说》《论衡》《集韵》四种恐难允许。其中《论语》一种可称次要。最好望吾兄设法交涉，乞其允许。如实在为难，则亦不妨作罢。”<sup>③</sup>

经过反复交涉，图书寮拟借之书终于有了点眉目。2月9日，马宗荣致书张元济及郑贞文，告以图书寮允许借照，但限制颇多，第一次许可照《论语注疏》《本草衍义》二种。但张元济最希望得到的宋刊《三国志》并不在其内，乃于2月16日致电马宗荣：“图书寮书以《三国志》最要，务设法作第一次借。”2月17日，又致电马宗荣，再申图书寮第一次借书以《三国志》易《论语[注疏]》或《本草[衍义]》二者之一。<sup>④</sup>2月20日，张元济在给马宗荣的一封信中，再一次强调了这一点：

图书寮之书业经取得，第一次之许可为《论语》《本草衍义》两种，惜《三国志》未曾在内。曾请郑心翁电商，设法交换。第一电语意未明，恐误会为要求加入《三国志》，变为三种，此殊不妥。故又请续发一电，申明以《三国志》换去《本草》或《论语》之一种，仍系请求两书，不过两书之中要有一部《三国志》在内耳。如能办到最好，否则亦弗勉强。好在第一次照完之后又可作第二次之陈请也。

图书寮第二次拟借之书，如《三国志》已经换入第一次，则被换去之一书当然作为第二次之第一种。如未能调换，则当然首用《三国志》。第二种拟用《世说新语》。<sup>⑤</sup>

实际上，第一次许借之书并没有换成，图书寮第二次借影仅获准《三国志》一部。<sup>⑥</sup>图书寮拟借之书次第尽管并不尽如人意，但得到正式许可，终究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足利文库拟借之书，即由于种种原因，未获许可。更让马宗荣忧心的是，他在东京的学业已完成，获得硕士学位，不可能再长久地在东京居留下去。而内阁文库拟借之书却仍未获正式许可。马宗荣在2月27日、3月2日写给郑贞文的两封信中，就强烈地表达了这种忧心，他在前一封信中写道：

近来，弟心中十分焦急，因内阁文库之事至今尚未正式许可。前托汪公使去一信与鳩山氏询之，（信由弟挂号寄去）亦似未答复。（汪无函与弟，似无复函）此间原因固因议会关系，鳩山氏未到内阁一步之故。然转瞬即届三月，弟此后之行止即将决定，甚欲早日结束此事故也。<sup>⑦</sup>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直到3月底、4月初，才得到内阁文库许可，但必须分批进行。4月4日，马宗荣致电张元济：“内阁之书与图书寮同，《册府元龟》作为第一次借，已被许可。”<sup>⑧</sup>静嘉堂借影交涉虽然比较顺利，但也仅是相对而言，3月12日，马宗荣致书张元济及郑贞文，就曾提到静嘉堂第二次照书定《诗集传》与《新唐书》，交涉极繁难。<sup>⑨</sup>正因为借影交涉异常繁难，亟需一个富有经验的人居间奔走斡旋。马宗荣既学图书馆学专业，熟悉日本汉籍的收藏机构，与日本学人又有较多交往，且富借影交涉经验，因此张元济和郑贞文都希望他留下来，坚持到借影竣事后再考虑自己的行止，因为很难找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对此，马宗荣深感为难，他后一封信中说：

借印书之事异常繁琐，确是事实。据弟两月以来的经验，须时时东奔西走，应付日人尤为困难。报告亦麻繁事。希其如计画所定而得早日成功，弟无所异言。惟嘱弟留此至竣事时止，恐事实上难以办到。因所选书甚多，恐非两年难竣工，弟万难再居留此至两年；其次酌给车马费与弟，骤使商馆负担加重，亦心

① 马宗荣：《致张元济、郑贞文函》，《张元济全集》第1卷，第181页。

②③⑤⑦ 《张元济全集》第1卷，第182、182、184、185页。

④⑥⑧⑨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318、319、320、319页。

所难安。诸乞学长再为详加考虑也。<sup>①</sup>

马宗荣原本准备完成学业后即回国，并不想久居东京。张元济和郑贞文对他的这一想法当然是理解的，但还是希望他能留下来帮忙。3月6日，张元济写给马宗荣的信中特别提到此事，他说：“至吾兄目下尚以暂进大学院为宜，国内风云甚急，不久恐又有意外发生，急归殊非得计<sup>②</sup>”。为了打消马的顾虑，3月13日，张元济在一封拟复马继华（宗荣）的信中说：借影日本各处之书，“时间不至过长，希半年以内或可结束”。<sup>③</sup>因为张元济和郑贞文请托，马宗荣并没有马上离开，还是留下来继续为借书事奔走。可惜的是，张人凤先生家藏的《马继华君来往信件（日本借书事）》稿本现仅存第1册，时间止于1929年4月4日，以后的情况因相关的来往信件散佚，已很难还原出借影交涉的后续过程。但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张元济与国内外文化人士通函中，保存有多封马宗荣与郑贞文及郑贞文与张元济的通信，其中马宗荣5月30日致郑贞文函，除了随函寄呈添置照相器材收据、《古今小说》《新唐书》《诗集传》《论语》等摄影费用收据及4、5月份杂费收据外，托郑贞文请张元济为宇野书一长歌，并另书四纸，每纸各书四字，下款书“中华学艺社赠”“张元济书”字样，上款一书“宇野哲人博士”，一书“诸桥辙次博士”，一书“岩崎男爵”，一书“长泽学士”，并告“此地所存尊款无几，此后须预为契约之书甚多，且实际上已由弟处直接补给后补半费，需款孔多，盼速斟酌汇款接济”。<sup>④</sup>宇野、诸桥、岩崎和长泽四人，都是此次借影交涉中的鼎力相助者，虽然马宗荣称“此亦渠等托旁人泄意所要者”，但此举包含的感谢之意是非常明显的。

尽管此次借影交涉过程中出现过一些未尽如人意之处，譬如张元济请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代向日本栃木县足利图书馆商借宋版《易》《书》《诗》三经注疏摄影印行，就曾遭到该馆拒绝。<sup>⑤</sup>马宗荣向图书寮、内阁文库等处借书过程亦充满周折，极为繁难。但最终的收获还是巨大的。马宗荣每获借影许可，即雇日本摄影师（早期主要是委托东京汤岛写真场摄影师户塚正幸<sup>⑥</sup>）用特种相机将各书逐页摄成底片，然后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以“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名义陆续影印出版。据郑贞文回忆，此次共向日本各藏书机构借影47种罕见古籍，其中宫内省图书寮7种，内阁文库29种，东洋文库2种，静嘉堂文库9种。<sup>⑦</sup>详见表1。

表1 借影书目表<sup>⑧</sup>

出处	借影书目	种数
宫内省图书寮	《论语注疏》（宋刊），《三国志》（宋刊），《三谷外集》（元刊），《太平御览》（宋刊），《本草衍义》（宋刊），《北碕文集》（宋刊），《北碕外集》（宋刊残本）	7种
内阁文库	《平斋文集》（宋刊），《东莱先生诗集》（宋刊），《晋书列传》（宋刊），《梅亭先生四六标准》（宋刊），《东坡集》（宋刊残本），《颍滨大全集》（宋刊），《全相平话》（元刊），《古今小说》（明刊），《醒世恒言》（明刊），《拍案惊奇（二刻）》（明刊），《警世通言》（明刊），《水浒传》（明刊），《水浒英雄传》（明刊），《玄雪谱》（明刊），《唐书演义》（明刊），《国色天香》（明刊），《摘锦奇香》（明刊），《玉谷调簧》（明刊），《济颠语录》（明刊），冯伯玉风月相思小传》（明刊），《荔镜记》（明刊），《孔淑芳双鱼坠传》（明刊），《张生彩鸾灯传》（明刊），《苏长公章台柳传》（明刊），《八洞天》（明刊），《词林一枝》（明刊），《八能奏锦》（明刊），《英雄谱》（明刊），《皇武英明传》（明刊）	29种
东洋文库	《历代地理指掌图》（宋刊），《乐善录》（宋刊）	2种
静嘉堂文库	《群经音辨》（影本钞本），《饮膳正要》（明刊），《册府元龟》（宋刊残本），《诗集传》（宋刊），《陈书》（宋刊），《新唐书》（宋刊），《欧公本末》（宋刊），《武经七书》（宋刊），《清明集》（宋刊残本）	9种

①②③ 《张元济全集》第1卷，第185、186、188页。

④ 陈正卿、李佳燕整理：《张元济来往书札之一》，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3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12—213页。

⑤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322页。

⑥ 张元济、郑贞文日本访书期间曾与户塚氏订有委托照相合同，该合同立于1928年11月18日，合同文本参见陈正卿、彭晓亮整理：《张元济来往书札之三》，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6辑，第307—308页。

⑦ 郑贞文回忆文章仅列46种，漏自图书寮借影的《北碕文集》（宋刊）一种，此据1930年6月22日张元济致傅增湘函所附“日本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东洋文库四家各书清单”增补。几乎所有的相关论述都认为这46种以中华学艺社名义向日本公私立图书馆借影的珍本古籍，在张元济回国前即已摄成底片，并携回上海。其实，这批书的借影过程是非常复杂、艰难的，张元济和郑贞文回国的时候，这个过程远未完成。因此，说张元济带回这批书的底片，是误读了郑贞文在《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的相关论述。

⑧ 据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提供的相关资料编制，该文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13—215页。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书目仅是以“中华学艺社”名义向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和东洋文库四家借影的古书目录,而据欧阳亮的研究认为,除上述书目外,还应包括《曼殊留影》、宋刊残本《梅宛陵集》、宋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3种。实际上,他们辑印的古书应为50种。<sup>①</sup>这还不包括张元济以个人名义或代商务印书馆借影的罕见宋元旧槧。实际上,除了以“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名义借影的上述珍籍外,张元济还以个人名义或代商务印书馆从静嘉堂文库等公私藏书机构借影了多部“中土久佚之书”。这些珍籍至少包括元刊本《金华黄先生文集》、残宋本《中庸说》、宋刊《周益公集》、元刊《东京梦华录》、元刊《济生拔萃》中的《鍼经节要》《汲古云歧》《鍼法汲古家珍》《保婴集》四种、宋刊《北碕诗集》,以及宋黄善夫刊本《史记》、宋刊《陈古灵先生文集》,等等。如果加上以中华学艺社名义借印的珍籍,张元济等人从日本借影的珍籍总计既不止47种,也不是50种,至少有61种。上海市档案馆度藏的张元济与日本友人的函件中,特别是他与长泽规矩也和诸桥辙次的通函中,保存着不少这方面的相关信息,值得在这里简单地交代一下。

这批函件涉及的时段集中在1935年到1938年间,也就是张元济以“中华学艺社”名义向日本公私藏书机构大规模借影珍本秘籍计划结束之后。由于这批重要的函件秘藏于上海市档案馆,一直不为人所知。张元济的哲嗣张树年和张人凤父子在主持编纂《张元济年谱》的时候显然不清楚这批函件的存在,因此这段往事在年谱中几乎没有反映,已有的相关论述对这段历史当然更无从知晓。随着这批函件的陆续公布,这段尘封的往事和历史,才可能得到比较完整的呈现。

从现存的函件看,长泽规矩也是一个关键人物。他不仅在张元济日本访书和随后的借影过程中出力甚多,而且一直极其关切、尊重和支持张元济主持的旧籍整理、影印规划。因为这种关切、尊重和支持,他与张元济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经常以书信方式互通消息,为张元济提供日本公私藏书机构相关典籍收藏与流通的最新情况及其他信息,并自愿为张元济联系借影事宜。1935年以后张元济从静嘉堂文库等公私藏书机构借影的多部“中土久佚之书”,都是长泽居间奔走的结果。张元济希望借影静嘉堂所藏宋刊《周益公集》和元刊《东京梦华录》,长泽即与静嘉堂文库长诸桥辙次联系,1935年2月19日致函张元济,告以宋刊《周益公集》和元刊《东京梦华录》已蒙诸桥博士快诺影印,“未悉贵馆方面意思如何,倘欲照印,从速赐复为盼”<sup>②</sup>。张元济接到这个消息,“欣喜过望”。3月7日,他在给长泽的复函中说:“承示静嘉堂藏残宋刊《周益公集》,又元刊《东京梦华录》诸桥博士快诺假我景〔影〕照,均赖先生玉成之力,至为感谢。”“宋刊《周益公集》敝邦久佚,亟愿流通。《东京梦华录》如原书不至模糊,亦拟借印。既荷先生暨诸桥博士美意,特许敝馆印行,拟即请转托樽井照相师为敝馆摄影。”复函中还恳请长泽“善为说辞”,再向静嘉堂借影元刊《济生拔萃》中的《鍼经节要》《汲古云歧》《鍼法汲古家珍》《保婴集》四书,因为这四种书在中国都是“久佚之书”,各公私藏家皆“无可借补”。<sup>③</sup>同时,他又应长泽善意提醒,“冒昧致诸桥博士一函”:一面感谢他同意借影静嘉堂珍藏残宋刊《周益公集》及元刊《东京梦华录》两书,一面请求诸桥慨允借影元刊《济生拔萃》中中国所缺《鍼经节要》《汲古云歧》《鍼法汲古家珍》《保婴集》四种。<sup>④</sup>因为一直没有得到回音,9月19日,张元济再次致函诸桥,恳请诸桥俯允,信中写道:“承慨借静嘉堂珍藏《周益公集》《东京梦华录》两书,均已摄照寄沪,感非言喻。惟另恳补照《济生拔萃》内所缺《鍼经节要》《汲古云歧》《鍼法汲古家珍》《保婴集》四种,在敝邦公私藏家已难物色,素仰嘉惠同文之盛意,不得已再以奉读,仍乞俯允借予摄照。俾敝邦久佚之帙得以流传,皆先生之所赐与者也。”<sup>⑤</sup>终获诸桥“鼎诺”之后,张元济于10月31日专函致谢,其中说:“《济生拔萃》中之《鍼经节要》《汲古云歧》《鍼法汲古家珍》《保婴集》四种为敝邦久佚之书,恳祈俯允摄照,俾便印行,以饷学界。今承鼎诺,见饷一鸥,并属即致函长泽先生商量照相之事,具征发扬古籍、垂顾同文之盛意,至为感荷。长泽先生处已专函请其即日转约技师诣

① 参见欧阳亮:《中华学艺社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度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36页。

②⑤ 陈正卿、彭晓亮整理:《张元济来往书札之三》,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6辑,第310、312页。

③④ 陈正卿、彭晓亮整理:《张元济来往书札之二》,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5辑,第216—217、218页。

前从事。屡相惊扰，无任悚惶。”<sup>①</sup>

大约在1936年初，长泽听说，宫内省图书寮近将改组，恐将来借照难办，于该年2月26日致函张元济，转达这一信息，并提醒说：“倘贵馆方面有照相该寮藏书，从速示寄是盼。”<sup>②</sup>得知这个消息，张元济喜出望外。3月14日，他复函长泽，并开示拟借影书单，信中说：“前得二月二十六日手教，转达樽井先生之言，谓图书寮不日改组，敝处如有借照之书，应速申请。谨查寮中藏有宋刊《集韵》、宋刊《游宦纪闻》、元刊残本《类编花果卉木全芳备祖前后集》，颇思借照，如照相价格无所增加，一切仍照去年三月所订合同办理。拟请代制申请书呈上，寮头允许后即行着手。”此后，张元济分别于7月3日、8月7日、8月31日、11月28日，以及1937年3月24日致函长泽，一再询问拟向图书寮借影各书的进展。<sup>③</sup>但因不久抗战军兴，此事最后是否办成不得而知。

除了替张元济向静嘉堂和图书寮商借中土“久佚之书”外，长泽还帮忙向日本私人藏家借影稀世珍本。譬如，他曾为张元济成功地从德富苏峰家藏中借影了宋刊《北碕诗集》。1935年3月11日，张元济曾为此事专函向长泽表示感谢，并交代摄影细节，信中写道：“德富苏峰先生所藏京（按：‘京’字疑为‘宋’字之误）刊《北碕诗集》，承代商允借影，感幸何极。其补抄之叶，能以五山复刊本配入，至为佳妙。将来与樽井照相师订立合同之后，即乞约同樽井氏前往商借，用八切片（每叶四十钱）摄影为荷。”<sup>④</sup>这部宋刊本最后即由樽井氏摄成照片共196叶，与向静嘉堂借影的《济生拔萃》中所缺四书计74叶一道寄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

从1935年到1937年，长泽至少为张元济暨商务印书馆借影了7种人间珍本，即向静嘉堂文库借影的宋刊《周益公集》、元刊《东京梦华录》、元刊《济生拔萃》中的《鍼经节要》《汲古云歧》《鍼法汲古家珍》《保婴集》四书，以及从德富苏峰家藏中借影的《北碕诗集》。这些珍本均由当地摄影师樽井氏按一定规格和尺寸摄成照片，寄回上海付印。

张元济日本访书的收获是巨大的，这些收获的取得，固然与张元济东渡之前的精心准备有关，与马宗荣等人的不懈努力有关，但更关键的是得到日本公私藏书机构和日本友人的鼎力相助。这些日本友人包括岩崎久弥男爵（东洋文库创始人）、冈部长景（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服部宇之吉（汉学家）、岩井大慧（博士，日本东洋文库文库长）、杉荣三郎（图书寮）、铃木重孝（图书寮）、樽井清五郎（图书寮）、秋山谦次郎（内阁文库）、樋口龙太郎（内阁文库）、姊崎正治（帝国大学图书馆馆长）、宇野哲人（汉学家）、盐谷温（汉学家）、松浦嘉三郎（东福寺）、荻野仲三郎（为借影《中庸说》，曾致书京都东福寺冈根上人，请其概允）、冈根守坚（东福寺）、吉川幸次郎（汉学家）、田中庆太郎（文求堂主人）、诸桥辙次（汉学家）、石田干之助（东洋文库）、长泽规矩也（汉学家）、内野皎亭、藤田昆一（静嘉堂）、饭田良平（静嘉堂）、德富苏峰（朝日新闻社社长）、户塚正幸（摄影师）、内藤湖南（汉学家）、狩野直喜（汉学家）、根津信治（静嘉堂）、长尾棹太郎（原商务印书馆职员）、神田喜一郎（汉学家）等。其中尤以长泽规矩也、诸桥辙次、内藤湖南出力最多，帮助最大，交往最密切，情谊亦最深厚持久。

长泽规矩也，1926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支那文学科毕业后，开始担任静嘉堂文库干事，直到1939年，主要从事编目工作。1928年10月24日，张元济抵达东京的当天晚上，长泽即前往张元济下榻处拜访，并约期陪同到静嘉堂文库浏览原函宋楼藏书。张元济在东京访书期间，得到他的全力协助，举凡商订借影合同、委托照相合同等，他无不躬与其役。在后来的借影交涉过程中，他更尽己所能地协助马宗荣，居间奔走。

①② 陈正卿、彭晓亮整理：《张元济来往书札之二》，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5辑，第221、228页。

③ 1936年7月3日，张元济致函长泽说：“前息转向图书寮借景宋刊《集韵》、宋刊《游宦纪闻》、元刊残本《类编花果卉木全芳备祖前后集》等书，想蒙商借就绪，并仍委托樽井君接续摄影矣。”8月7日函又提及此事：“至借照图书寮之书尚须与铃木重孝氏接洽，如有困难，即请作罢。”8月31日函称：“借景图书寮善本，蒙续与铃木先生商酌，尤深衔感。”11月28日函再度询问：“前拟借影图书寮宋刊《集韵》、宋刊《游宦纪闻》、元刊残本《类编花果卉木全芳备祖前后集》，奉示因有困难，须与铃木重孝君商议，不知能邀允许否？”1937年3月24日函仍在关切：“拟借影图书宋刊《集韵》，又《游宦纪闻》、元刊残本《类编花果卉木全芳备祖》，不知尚有希望否？然如有不便，则亦不敢强求。”（各函见陈正卿、彭晓亮整理：《张元济来往书札之二》，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5辑，第231、232、236、238、241页。

④ 陈正卿、彭晓亮整理：《张元济来往书札之二》，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5辑，第218页。

不独静嘉堂，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洋文库等处亦尽力居间协调、斡旋。所以，1929年3月13日张元济在拟复马继华信中，特别提到：“长泽君相助之处尤多，凡在日本所照之书均当赠送。”<sup>①</sup>正因为如此，后来长泽多次到苏杭沪宁等地访书，也得到了张元济的周到安排，譬如1929年夏天他到苏州访书，经张元济介绍，得以“参观潘、郑两家的藏书，更见到了久闻大名的吴梅氏，参观了他珍藏的戏曲书，非常愉快”。<sup>②</sup>他到杭州访书，商务印书馆还特地派俞渊和黄氏作他的向导；他到扬州访书，张元济更派自己的侄子张树源及其朋友扬州人李振先陪同，并尽地主之谊。<sup>③</sup>

诸桥辙次，曾于1919年至1921年到中国留学，1928年张元济日本访书时，诸桥担任静嘉堂文库长。他数年前曾到过上海，与张元济晤谈甚欢。这次在东京重逢，格外亲切，他陪同张元济参观并瞻仰岩崎男爵遗像及墓地，张元济有诗句云：“旧朋握手喜相见，指公遗像陈堂前。”<sup>④</sup>诸桥不仅在查阅和借印方面尽可能提供方便，而且还将馆长室长期借与马宗荣等作为照书之房屋。张元济对静嘉堂及诸桥之托，当然也是有求必应。他曾应静嘉堂邀请，为其书写诗句及“百国春秋楼”横轴；又曾应诸桥之托，为其所撰《儒林生卒年表》调查王国维、叶德辉两先生生年及其在世年岁，并安排出版。因此诸桥在该书“凡例”中特别申谢：“本表出版烦劳于旧友张菊生先生者甚多，谨志申谢。”<sup>⑤</sup>令人感慨的是，该书印成后，因“辽事忽起，种种障碍，未曾发行”，后竟毁于日本人发动的一·二八事变！1932年12月21日，张元济在写给诸桥的一封信中不胜其感慨地说：“先生多年心血，至今片纸无存。敝公司未能先事绸缪，曷胜欠疚。编译所设于东方图书馆楼下，被灾最烈，簿册无存。展读来书，同人往复思维，无从确答。”<sup>⑥</sup>

在张元济的日本友人中，内藤湖南是他最早相识的一位。1899年11月，内藤访问上海，就曾以笔谈方式与张元济纵论政治、经济、教育诸问题。笔谈结束时，张元济还即席赋诗一首赠内藤。诗云：“海上相逢一叶槎，愤谈时事相交加。愿君椽笔张公论，半壁东南亦辅车。”<sup>⑦</sup>也许是因为这一层关系，1928年10月中旬，张元济抵京都后，即拜访内藤，并得到他的关照，包括介绍观阅故富冈氏遗书、告知东福寺藏有张元济先祖张九成的《中庸说》等。11月26日，张元济于归国途中，到京都再访内藤于恭仁山庄，与其晤谈甚欢，并赋诗谨志，诗云：“宿雾冲京驿，清流渡木津。长桥凌碧波，叠嶂远红尘。橘柿林容淡，茶桑穉事新。山居真可羨，图籍更纷陈。”<sup>⑧</sup>晤谈中，张元济出示《涉园图卷》，请内藤题跋。内藤乃赋诗三首：

名园日涉以成趣，浙右故家张氏开。

丽载林泉明瑟地，几披图卷费低回。

横浦先生宋代贤，尚书传统论森然。

感君堂构绍先业，一姓菟文哀作篇。

申江把臂卅年前，白发重逢东海天。

山野数弓人海外，同烹苦茗校陈编。<sup>⑨</sup>

这三首诗，一写张氏故园，二写张氏文脉，三写与张交谊。都说内藤之学博综研精，其实，他的汉诗文亦吐属不群。张元济与内藤湖南之间的相互唱和，给彼此留下了一段愉快的记忆。1930年9月26日，内藤在写给张元济的一封信中，还念念不忘地提到这段往事，信中说：“前年见访山庄，商榷经籍，畅谈之快，

① 《张元济全集》第1卷，第187页。

②③ 长泽规矩也：《中华民国书林一瞥》，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第225、226—227页。

④ 张元济：《戊辰暮秋至日本东京观静嘉堂藏书，赠岩崎男爵等》，《张元济诗文》，第9页。

⑤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319页。

⑥ 《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572页。

⑦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32—33页。笔谈内容见印晓峰点校：《内藤湖南汉诗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73—478页。

⑧ 张元济：《戊辰初冬过内藤湖南山斋晤谈甚欢谨志》，《张元济诗文》，第19—20页。

⑨ 内藤湖南：《戊辰十一月念六张菊生来访出涉园图卷索跋即赋三首》，印晓峰点校：《内藤湖南汉诗文集》，第44页。

至今未忘也。”<sup>①</sup> 并别封奉呈张元济《溃痈流毒》一书。该书系钞本，共四册，藏京都府立图书馆，由鹤涧居士汇录鸦片战争时期公牍而成，是研究鸦片战争史事的参考资料。内藤发现此书后，“以其有益鸦片战役史事”，乃雇书手抄录两份，一份送给罗振玉（叔言），另一份原本拟送汪康年（穰卿），录副“未成而穰卿即世”，乃奉赠张元济，是希望他能印行此书。<sup>②</sup>

张元济与日本友人之间这种基于书籍交流的雅谊，一直伴随着张元济，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借影的结束而改变。当这一批从日本公私藏书机构借影的珍本秘籍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后，作为回馈和书生人情，张元济开始向各借影机构和日本友人赠书，并分别致函申谢。张元济的赠书，大致由三种类型组成：

第一种类型是协议赠书。张元济日本访书期间，曾以中华学艺社的名义委托马宗荣与长泽规矩也订立赠书协议，即“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出版后，必须向各借影机构及相关人员赠书，1935年1月18日，长泽看到报上登载《续古逸丛书》和《辑印古书》出版广告后，曾专门致函张元济，详细地列出了依协议应当赠书的机构和个人名单、赠书数目及通讯地址，这个名单如下：《辑印古书》每种一部，赠宇野博士、静嘉堂、图书寮各一部；自图书寮借出者，赠图书寮（一共两部）、寮头、铃木事务官、榑井囑托各一部；自内阁文库借出者，赠内阁文库、秋山属、樋口属各一部；自静嘉堂借照者，赠文库（一共两部）、藤田执事、诸桥博士、饭田氏各一部；自东洋文库借照者，赠东洋文库、石田氏。<sup>③</sup> 这部分赠书本应由中华学艺社负责，“惟自郑心南、马宗华二君相继离沪，深恐社中无专责之人，漏送在所不免”。因此，张元济决定，一律由商务印书馆补送，以答雅谊。<sup>④</sup>

第二种类型是向所有直接或间接地提供过帮助的机构和个人赠书。如前所述，张元济的日本访书和借影活动曾得到过许多日本机构和友人的“赞助”，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报答，这部分赠书并不限于借影出版的书籍。查上海市档案馆所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5、6辑公布的《张元济来往书札》中的相关资料可知，宫内省图书寮、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等机构，以及宇野哲人、诸桥辙次、岩崎久弥、岩井大慧、长泽规矩也、狩野直喜、长尾雨山、根津信治、饭田良平、福井氏、松浦嘉三郎、冈根守坚、榑井氏、铃木重孝、杉荣三郎、石田幹之助、荻野伸三郎、吉川幸次郎、泽村幸夫、服部宇之吉、德富苏峰、黑井悌次郎、上杉伯爵、盐谷温黑等友人，都曾得到张元济数量不等的赠书，少则一两部（部），多则数十种（部），其中长泽规矩也、宇野哲人、诸桥辙次等人所得最多，单长泽规矩也一人所得赠书即包括：《武经七书》《名公书判清明集》《乐善录》《搜神秘览》《太平御览》《群经音辨》《饮膳正要》《东莱先生诗集》《平斋文集》《梅亭先生四六标准》《山谷外集诗注》《百衲本廿四史》，又《中庸说》大本一部，缩本《中庸说》《孟子传》各一部，景宋残本《公羊单疏》，景印黄善夫本《史记》一部，残宋刊《新唐书》一部，《济生拔萃》四种一部。无论是赠书给机构，还是赠书给个人，张元济一般均附手书，详述赠书缘由，并深致谢忱。虽然现存张元济与日本公私藏家的往来书札并不足以反映张元济赠书的全貌，但仅据上文所列已足见张元济赠书规模之庞大，以及他与日本文化界交游之广。

第三类是回赠与互赠。此类赠书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张元济接到日本藏书家或友人的赠书后，回赠对方；一是日本藏书家或友人获张元济赠书后，回赠张元济。这是中日学人交往中非常普遍的一种赠书类型。早在张元济日本访书之前，就已开始了。譬如1927年9月，日本尊经阁主人石黑文吉致函张元济，并赠《重广会史》上帙一部，张元济收到后，“开缄展诵，知是书刊印已阅八百余载，在敝国久经亡佚，今借贵国鼎力，得以复见于世，盛版大业，钦仰无穷，宠贶遥颁，莫名感谢”。于1928年1月23日复函致谢，并回赠《横浦文集》一部，该书“自明季覆印之后，三百年来亦已绝版，在敝邦之内素称罕见，近由鄙人用明

① 印晓峰点校：《内藤湖南汉诗文集》，第444页。

② 内藤湖南：《写本溃痈流毒跋》，印晓峰点校：《内藤湖南汉诗文集》，第462—463页。不知何故，此书在张元济生前并没有出版，但他一直放在心上，曾作跋语云：“此书为日本内藤虎次郎所赠，恐今后无以慰两死友之望矣。菊生。”两死友当指汪康年和内藤湖南，汪卒于1911年，内藤卒于1934年6月。后被纳入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鸦片战争》，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④ 陈正卿、彭晓亮整理：《张元济来往书札之二》，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5辑，第214、223页。

本覆印，谨寄呈二部，乞代呈通侯爵，一以奉赠阁下”<sup>①</sup>。但1928年张元济日本访书之后，互赠珍籍就越发频繁了。1936年5月22日，吉川幸次郎获赠《横浦文集》《词林纪事》各一部，乃致函张元济表示感谢，除按期奉呈《东方学报》外，并回赠帝国大学景印的《一神论》《大唐三藏法师传》及新增汉籍目录各一部，略答高谊。同时另邮附上拙刻《周髀算经图注》一册。<sup>②</sup>9月14日，吉川承赠《中庸说》《孟子传》各二部，乃复函称谢，并寄上东福寺所藏的宋版《义楚六帖》书景〔影〕四页，以为答谢。这种回赠与互赠，在张元济与长泽、诸桥之间就更是司空见惯。1936年9月8日，长泽奉到张元济寄呈的景印《公羊单疏》，即惠赐张元济图书寮书影两部。<sup>③</sup>后又按号奉赠其独力经营的《书法学》杂志。<sup>④</sup>由于诸桥在张元济访书及随后的借影过程出力颇多，张元济自日本借影各书无论是否借自静嘉堂，皆一一奉寄。此种雅谊，诸桥当然心领，每以静嘉堂景印佳刻，如《唐百家诗选》《皇朝编年备要》等回赠。1936年9月4日，他致函张元济称：“敝库亦有《静嘉堂秘笈》及《静嘉堂丛书》付印之企，秋天印成之后将奉呈。”<sup>⑤</sup>回赠与互赠，并不仅限于个人之间或机构之间，机构与个人之间亦不乏此类互动。1936年7月15日，张元济收到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古写本《文选集注》第五、六集，合共两函，他致函申谢外，立即回赠该部由商务印书馆景印的明刊《永乐大典水经注》一部，并称“此书中经散佚而首尾完具，良非偶然。敬乞玄评，藉答雅谊”<sup>⑥</sup>。1936年底，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向诸桥奉赠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图说一部，诸桥致函张元济称：“该书景〔影〕印精美，东邦艺术之粹收在一书，尤足玩赏，当长珍藏。”<sup>⑦</sup>

协议赠书，报答性赠书，回赠与互赠，张元济以多种类型的赠书为自己的日本访书与借影过程画上了一个句号。本来，这个过程还将持续下去，但残酷的民族战争中断了这个过程，因此，这个句号本身又夹杂着一种无法言说的历史无奈和悲怆。

### 三、多重意义：版本价值与民族记忆的修复

中国学人日本访书既非始于张元济，当然亦非终于张元济。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中国学人到日本访书，其中最最有成就的当推杨守敬和董康；在他之后，更不乏其人，如傅增湘、孙楷第、王古鲁等人皆是。

杨守敬于1880年应驻日公使何如璋之召，赴日本任使馆参赞。甫时日本正值明治维新之际，“脱亚入欧”甚嚣尘上，西学东渐乃呈沛然莫御之势。在此种背景之下，被江户幕府尊奉为官学的“儒学”遂为梯航而来的“洋学”取代，与此相对应，汉籍身价一落千丈，“故家旧藏”纷纷散出，渐归于书肆冷摊。杨守敬曾在《日本访书志缘起》中叙其事道：

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尔时贩鬻于我土者，不下数千万卷。犹忆前数  
年有蔡姓者载书一船，道出宜昌。友人饶季音得南宋板《吕氏读诗记》一部，据云宋、元槧甚多，意必有秘  
籍孤本错杂于其中，未知流落得所否？<sup>⑧</sup>

杨守敬于“目录之学，素无渊源”，到日本之后，但“念欧公百篇尚存之语，颇有搜罗放佚之志”。于是“乃日游市上。凡板已毁坏者皆购之，不一年遂有三万余卷。其中虽无秦火不焚之籍，实有裔然未献之书。”<sup>⑨</sup>1881年黎庶昌接任公使，“议刻《古逸丛书》，嘱守敬极力搜访。而藏在其好古家者，不可以金币得。属有天幸，守敬所携古金石文字，乃多日本所未见者，彼此交易。于是其国著录之书麇集于篋中”。<sup>⑩</sup>后来，杨守敬在其自撰《年谱》中说：“又得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其时立之尚存，乃按目索之，其能购者，不惜重值，遂已十得八九，且有为立之所不载者数百种。”<sup>⑪</sup>其中“争宜刊布”的古本逸编，厥后多刻入黎庶昌主持、杨守敬编校并在东京辑印的《古逸丛书》。丛书共收书26种，200卷。除《日本国见在书目一卷》为日

①②⑤⑦ 陈正卿、彭晓亮整理：《张元济来往书札之三》，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6辑，第306、315、317、319页。

③④⑥ 陈正卿、彭晓亮整理：《张元济来往书札之二》，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5辑，第238、240、231—232页。

⑧⑨⑩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2、1页。

⑪ 《杨守敬集》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页。

本人藤原佐世撰，其余 25 种多为中土久佚之书或稀见珍本。<sup>①</sup> 由于《古逸丛书》所收多中国亡佚不存之书，且刻工精良，历来受到学界的推重。

杨守敬日本访书，前后历时四年，其间“每得一书，即略为考其原委，别纸记之。久之得廿余册，拟归后与同人才相考证，为之提要”，归国后辑为《日本访书志》刊行于世。但因年老无力整理，又襄助无人，“其中不尽罕见之书，而惊人秘籍尚多未录出者”。<sup>②</sup> 这批得自日本书肆的大宗“旧本”舶载西归后，随杨守敬辗转于湖北黄州、武昌、上海等地。杨守敬去世后，观海楼藏书的一部分归于北平故宫博物院，曾在该院任职的王重民“即其批本逐录序跋，复以数年之力，参之他书”，辑成《日本访书志补》，共收入杨氏题跋逸文 46 篇。两书虽并不足以反映杨守敬日本搜书的全部成果，但已足可概见他所见之广和网罗之富。<sup>③</sup>

继杨守敬之后，董康自 1902 年起利用公差、私游等各种机会，先后八次到日本访书。<sup>④</sup> 董康日本访书，虽与杨守敬前后相继，但已远不如杨氏那般幸运。杨氏开始搜罗放佚的时候，“书肆于旧板尚不甚珍重”，所以他可以大搜秘籍，不及一年即得三万余卷。“及余购求不已，其国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争之。于是旧本日稀，书估得一嘉靖本亦视为秘笈，而余力竭矣。然以余一人好尚之笃，使彼国已弃之肉复登于俎，自今以往，谅不至拉杂而摧烧之矣。则彼之视为奇货，固余之所厚望也。近日则闻什袭藏之，不以售外人矣。”<sup>⑤</sup> 的确如此，董康盘桓两京的时候，旧书店已难见珍本，即使偶尔见到，其价目之昂亦非一般人所能承受。1927 年 1 月 6 日，董康曾到佐佐木山田书肆访书，看到的就是这般景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汇文堂各书店苦无佳册，佐佐木有元和活字本《事宝类苑》，索价一千圆。询以早年仅三五十圆，价目何以骤昂？曰：经董先生刻之，固应有此高价。又缩刻石经，索价八百圆。忆及癸亥年经此，在该店购宋槧《诗人玉屑》仅九十圆。前后四年，差异如此，非寒畯所能过问矣。<sup>⑥</sup>

在此旧籍价目骤昂的年代，董康当然不可能像杨守敬那样“购求不已”，若偶有所获，就已很不错了。因此，他的日本访书就只能就馆翻检。由于董康在日本学界有不少旧雨新朋，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稻叶岩吉等一流的汉学家，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如神田喜一郎、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都是他熟识的朋友，东京的盐谷温、长泽规矩也等也与他有着不浅的学谊，因此而得以自由出入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洋文库等公私藏书机构，饱览那里度藏的稀见秘笈，“凡遇旧槧孤本，记其版式，存其题识，积时未久，居然成帙。”<sup>⑦</sup> 于是而有《书舶庸谭》。董康在访书过程中，对戏曲小说颇为留意，曾于内阁文库摘录明板小说、戏曲百余种，胡适为《书舶庸谭》所作序言中特别提到这一点：

关于小说戏曲的访求和记载，董先生的书也有重要贡献。如内阁所藏小说中，有《封神演义》，是明刻本，编者许仲琳。此书作者的姓名，在中国久无可考，赖有此本可供考证。又如《岳武穆演义》，本子最多，最难考证；《内阁目》有明余应鳌编的八卷本，有明熊大木编的十卷本；又有十一卷的嘉靖三十一年本，

① 具体入选书目及版本如下：影宋蜀大字本《尔雅》3 卷，影宋绍熙本《谷梁传》12 卷，覆正平本《论语集解》10 卷，覆元至正本《易经传》6 卷，《系辞精义》2 卷，覆旧钞卷子本《唐开元御注孝经》1 卷，《集唐字老子注》2 卷，影字台州本《荀子》20 卷，影字本《庄子注疏》10 卷，覆元本《楚辞集注》8 卷，《辩证》2 卷，《后语》6 卷，影宋蜀大字本《尚书释音》1 卷，影旧钞卷子原本《玉篇》零本 3 卷半，覆宋本《重修广韵》5 卷，覆元泰定本《广韵》5 卷，覆旧钞卷子本《玉烛宝典》11 卷，影旧钞卷子本《文馆词林》13 卷半，影旧钞卷子本《王周玉集》2 卷，影北字本《姓解》3 卷，覆永禄本《韵镜》1 卷，影旧钞卷子本《日本见在书目》1 卷，影宋本《史略》6 卷，影唐写本《汉书·食货志》1 卷，仿唐石经体写本《急就篇》1 卷，覆麻沙本《草堂诗笺》40 卷，《外集》1 卷，《补遗》10 卷，《传序碑铭》1 卷，《目录》2 卷，《年谱》2 卷，《诗话》2 卷。影旧钞卷子本《碣石调幽兰》1 卷，影旧钞卷子本《天台山记》1 卷，影宋本《太平寰宇记补阙》5 卷半。《古逸丛书》的版本价值和文献价值自不待言，但因在东京刊行，且仅刻百部，流传不广。

②⑤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第 1、4 页。

③ 观海楼的部分藏书后从北平迁往台北故宫博物院，据吴哲夫《故宫藏书鸟瞰》一文披露：这批图书依版本区分，有宋刊本 13 种，元刊本 56 种，明刊本 358 种，清刊本 450 种，钞本 24 种，日本刊本 330 种，日本钞本 407 种，韩国刊本 28 种，共计 1666 种。该文载《故宫文物月刊》第 4 卷第 7 期，1986 年 10 月出版。

④ 董康八次日本之行的时间依次是：1902 年，1906 年初夏到岁末，1913 年，1923 年，1926 年 12 月 30 日至 1927 年 5 月 1 日，1933 年 11 月 8 日至 1934 年 1 月 22 日，1935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18 日，1936 年 8 月 19 日至 9 月 15 日。其中前四次的情况不甚清楚，后四次访书在其所撰《书舶庸谭》9 卷本中有详细的记载。

⑥ 董康：《书舶庸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8 页。

⑦ 董康：《书舶庸谭·自序》。

前八编为熊大木编，后集三卷为李春芳编。北京朱希祖先生藏有明刻本，编者为理学名儒邹元标，也和今本大不相同。若合此诸本，将来定可以看出此书演变的线索了。又《英烈传》也有种种不同的本子。内阁所藏也有三种明刻本，都可供比较的研究。

因此，胡适称赞“董先生是近几十年来搜罗民间文学最有功的人，他在这四卷书里记录了许多流传在日本的旧本小说，使将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因此知道史料的所在”<sup>①</sup>。当然，董康的日本访书也有不如意的时候，譬如他持内藤湖南特函推荐，赴京都东福寺看《太平御览》《义楚六帖》及《中庸说》等秘笈，就曾遭对方婉拒，“以未检出为对”。

至于傅增湘的日本访书，则是另一个值得记述的事件。傅增湘是民国时期有数的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大家，张元济到日本访书的时候，他本欲追踪东去，因迁葬双亲期迫，“遂尔作罢”。张元济访书归来后，曾于1928年12月7日、11日致函傅增湘，并附上长歌（即《戊辰暮秋至日本东京观静嘉堂藏书，赠岩崎男爵等》）及日本访书目录，这让傅增湘“欣抃无似”。12月20日，他复函说：“长歌拜诵一过，使我东游之志勃然而起矣。”<sup>②</sup>1929年11月9日，傅增湘启程赴东京、京都等地访书，12月4日回北京。因为有长泽、田中陪同，又有张元济访书手册作为先导，各处访书相当顺利。在短短二十余天时间里，先后到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前田氏尊经阁、东洋文库、内藤氏恭仁山庄和西京诸古刹等处查阅所藏善本。他曾于11月22日在京都客邸致函张元济，交流访书所获，其中写道：

静嘉堂宋本略得遍观，其伪者为之纠正不少。《韦钱塘集》乃宋刊之初印者，侍先观其刀法、纸质，已定为宋本。及细检（宋本缺卷正如此，若明本何缘亦缺首二卷耶？）则避讳字不少，当即吴匏庵旧藏之本。然舍此亦别无宋本，洵海内孤帙。公似不可不摄影印行（今本仍十四卷，不以残本论也）。已告长泽改正，此与公改订《平斋文集》为宋本正同，亦此行最快意之事也。又静嘉藏《册府元龟》，其各卷中可以补今本之脱文者凡七千余字，尽一日之力全行录完，自谓神速。内阁有类编《颖滨大全集》宋刊本一百三十卷（原题元本），只缺十余卷（缺十一至二十），公何妨并影以归，此书宋本最难见也。其余各处之书，所见亦有与公不同者，容再详陈。静嘉御览乃南宋本，公如印行，仍取之寮本，而以东福寺本补之，则完美矣。内野之《宛陵集》曾影得否？侍以先睹为快（如有影宋，可否先以赐寄一校，可作一长跋也）<sup>③</sup>

在随后与张元济的论书尺牍中，继续就张元济拟借影书目提出建议。12月9日，他又致书张元济：“《颖滨大全集》内阁文库以为元板，其实乃宋建本，与山谷同时所刻。印亦精湛，决可影印……《太平御览》以东福寺补入最宜，托狩野介绍似可办到。陆氏藏乃南宋本，所差太远也。”<sup>④</sup>四天后，再次致函张元济，函称：

韦骧《钱塘集》极初印，四库所收亦只十四卷，虽残本与完本不异，大可印行，此一事也；图书寮宋刊《初学记》极精美，古类书难得旧本，明本脱误不可计，有脱至数叶者，有淆乱不可言者，赖有宋本可校正。曾见涵芬藏严氏校宋本，然考之，所见亦明翻宋本，非真宋本也，不过视明诸刊本为善耳。寮本急宜印行，此又一事也；《太平御览》东福寺本完善，托狩野即可借照，务合之以成完璧。静嘉南宋本逊此远矣，此又一事也；《颖滨大全集》缺十至二十卷，但此乃分类编，他本不能补也，然小苏古刊最少完者，亦宜急印之。若与山谷同印，允称双美矣，此又一事也。此外册中所记拟照之书，侍亦略有所见，尽可删去零种，多照巨帙，较为合宜。别纸详之，乞裁酌。<sup>⑤</sup>

傅增湘的这些建议，基本上都被张元济采纳了，静嘉堂所藏《册府元龟》、内阁文库所藏《颖滨大全集》，以及内野氏所藏《宛陵集》等，后来都设法借影以归，影印出版。至于对静嘉堂藏《韦钱塘集》及内阁藏类编《颖滨大全集》刊本的纠谬，静嘉堂和内阁文库亦据以改正。傅增湘此行查阅善本汉籍170余种，回国后略加董理考证，并参酌张元济的《日本访书手册》等资料，撰成《藏园东游别录》4卷。后经整理，编入《藏园群书经眼录》，于1983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① 胡适：《书舶庸谭·序》。

②③④⑤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197、211、211—212、212页。

傅增湘之后，孙楷第因撰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戏曲部分的需要，受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委托，于1931年专程到日本访查古代小说的收藏情况，先后在东京的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东京帝国大学、静嘉堂文库、前田氏尊经阁、德富苏峰氏、盐谷温、神山闰次等处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并为其所见110部小说一一作了提要，最后汇编成《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6卷。书中提到的小说书目，大多是中国早已失传或稀见的版本。胡适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曾感慨道：“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做了中国旧小说的桃花源，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这许多的旧刻小说，我们决不能真正明了中国短篇与长篇小说的发达演变史。”<sup>①</sup>

孙楷第之外，王古鲁是另一位专门到日本寻访中国小说戏曲史料并有重大收获的学者。他在二战期间在日本找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小说戏曲史料，并拍摄摄取了大量的小说照片，譬如国内失传已久的崇祯元年尚友堂刊《拍案惊奇》（即“初刻拍案惊奇”）40卷足本，就是他于1941年在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发现的。根据这一批资料，他回国后撰写并发表了《日本所藏的中国旧刻小说戏曲》《日光访书记》《稗海一勺录》等有分量的论文。他的日本访书记，后整理成《王古鲁日本访书记》于1986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以上所述近代中国学人日本访书，无论是杨守敬、董康、傅增湘，还是孙楷第、王古鲁，无疑都各有重要的收获和成就。然而，在这个绵长的中国学人日本访书的历史脉络中，1928年张元济日本访书，无论就域外访书史而言，还是就近代中国旧籍出版史而言，都是格外值得重视的一件大事。虽然，张元济日本访书持续的时间甚短，仅一个半月，但他查访之广、寓目的善本之众，借影携归的秘笈之多，影印出版后影响之深远，在当时和尔后都是极为罕见的。

如前节所述，张元济此次日本访书收获巨大，其中以中华学艺社名义成功借影珍籍50种，再加上以他个人名义或代商务印书馆商借的“中土久佚之书”11种，总数达61种。这些珍籍绝大部分在中国早已失传，或仅有存目，或残缺不全，而今失而复得，或据以补配而成完璧，这在中国书籍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都是一件大放异彩的事件。张元济在为各书作跋的时候，凡论及此事皆喜不自胜。譬如，元刊本《金华黄先生文集》，凡43卷，为归安陆氏皕宋楼所藏孤本，皕宋楼流入东瀛，其本遂佚于中土。《四部丛刊》初印时，因未见元刊本，只得以景写本传之于世。1926年《四部丛刊》重印时，向常熟瞿氏、上元宗氏乞借所蓄残本，“谋为碎锦之合”，但去其重复，仅得31卷。1928年，张元济东渡扶桑访书，“始于静嘉堂插架，获睹其全。举所不足者，告之主者，慨然许我景印，私喜有志竟成，不啻完璧归赵也”。“回视百年前残帙流传，前贤宝贵若此，今得合浦珠还，重致完书于既佚之后，益不胜其私幸已！”<sup>②</sup>影宋钞本《群经音辨》，系皕宋楼所藏故物，陆心源《仪顾堂题跋》曾列书中佳处五十余条，张元济举泽存堂本复校，发现佳处远较陆氏所举为多，“所惜纸墨黝黑，不宜摄影”。后从静嘉堂成功借影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张元济分外喜悦。他为该书所作跋语中就表达了这种喜悦，他说：“窃幸毛钞尚在人间，今得借印流传，于愿良用欣愜！”并对岩崎氏“不吝一瓿之赐”表示感谢。宋本《东莱先生诗集》是日本内阁文库庋藏的宋乾道刊本，早已绝迹中土。张元济日本访书时借影携归，与涵芬楼所藏陈仲鱼钞本互校，发现陈本谬误极多，其他传本，更无法比拟。张元济在跋语中说：“东莱于江西诗派中，自居殿军，得此真本传世，诃非学者之幸，而亦邻邦七百年藏弄之贻也。”<sup>③</sup>影宋钞本《平斋文集》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是一稀见之本，但缺8卷（卷11—14，卷19—22），张元济日本访书期间，内阁文库“典守者发篋相际，适见是集，且为宋刻。瞿氏所阙八卷，俨然具存。借影携归，与瞿本合印，遂成完璧”。他在跋语的最后情不自禁地说：“夫以一书沈蕤数百年，且离散于数千里之外，一旦得为延津之合，复与人世相见，是可喜已！”<sup>④</sup>残宋本《中庸说》系张氏先

① 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胡适学论文集·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198页。

② 张元济：《元刊本〈金华黄先生文集〉札记》，《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第870—871页。

③ 张元济：《宋本〈东莱先生诗集〉跋》，《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第914页。

④ 张元济：《影宋钞本〈平斋文集〉跋》，《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第915页。

祖张九成所作，久佚于中土，1928年张元济从京都东福寺借影以归，可惜的是后半部分已佚，仅余四十叶。但此书“自宋迄今，无复刊行”，能从海外得此残本，“复印以饷今之学者，且冀其因有异同，而得并存焉，则幸甚矣！”<sup>①</sup>宋本《太平御览》为“有宋一大著作”，凡一千卷。国内所存刊本多残缺不全，张元济日本访书时，于帝室图书寮、京都东福寺，获见宋蜀刻本，“虽各有残佚，然视陆氏为赢”，乃借影而归，共得目录15卷，正书945卷；又从静嘉堂文库所藏建宁本补照第42—61卷，第117—125卷，凡29卷。尚缺26卷，又补以日本喜多邨直宽的聚珍本。“终于把这部卷帙浩繁的大书，用最早、最好的版本配成完璧，恢复原书的面貌，具有极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sup>②</sup>

在这些得自日本的珍本秘籍中，几部正史刻本值得特别提一下。宋黄善夫刻本《史记》，是现存《史记》三家注合刻最早的本子，国内早已佚而不存。同光年间黄善夫本从日本流回，但被书贾拆成三部分出售，涵芬楼得其中66卷，其余数卷为潘宗周、傅增湘所得。张元济集国内所有，但仍有缺略，因从日本上杉侯爵所藏借补，“幸成完璧”。他在跋语中说：“使是书长留海外，不复归于中土，抑或简断编残，不获通假，俾完原璧，则此百条之《正义》，岂终不长此沈蕤乎？是不能不为是书庆已！”<sup>③</sup>宋绍兴刊本《三国志》系以中华学艺社名义从日本图书寮借影携归，原缺《魏志》3卷，以涵芬楼藏宋绍兴刊本配补。宋蜀刻大字本《陈书》旧藏北平图书馆，但仅存21卷，张元济日本访书期间由静嘉堂文库影得同式印本，补配北平图书馆藏本，做到天衣无缝。宋刻本《新唐书》系以中华学艺社名义借照静嘉堂文库所藏北宋嘉祐刊本，缺卷以北平图书馆藏残帙、商丘宋氏所藏配补，“然犹缺《表》之第8、9卷，又原目亦仅存五叶，不得已更缩刘本（嘉业堂藏本）以足之，于是此书全为宋刻矣”<sup>④</sup>。

书贵初刻，这是张元济一贯的主张。自1926年退休以后，他致全力于中国古籍善本的抢救、整理与影印，为商务印书馆主持编纂一系列古籍影印丛书，他就是为这些丛书而四处广求善本，为广求善本而“远驰域外”。这些从日本借影的珍本秘籍，有不少后来相继被编入他主持编纂的大型古籍丛书。其中元刊本《金华黄先生文集》，影宋钞本《群经音辨》、明本《饮膳正要》、元本《山谷外集诗注》、宋本《东莱先生诗集》、影宋钞本《平斋文集》、宋本《梅先生四六标准》，残宋本《中庸说》、宋本及日本聚珍本《太平御览》等9种被编入《四部丛刊》初编、续编和三编；宋黄善夫刻本《史记》、宋绍兴刻本《三国志》、宋刻本《晋书》、宋蜀刻大字本《陈书》、宋刻本《新唐书》等4种，与国内相关藏本补配后，编入《百衲本二十四史》；宋绍定本《乐善录》、宋本《名公书判清明集》、宋本《武经七书》、宋本《搜神秘览》、残宋本《中庸说》等5种，编入《续古逸丛书》。还有一些珍本原拟编入相关丛书，如宋刊本《册府元龟》原拟编入《四部丛刊》四编，宋刊《历代地理指掌图》拟编入《续古逸丛书》，因战争而作罢。这些“中土久佚”珍本的编入，使沈蕤数百年之久、离散于异域的古本逸编得以复见于故土，并重新楔入中华民族的历史与记忆。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版本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民族记忆的修复和民族精神的再构。

1937年2月，张元济在为《百衲本二十四史》所作“后序”中说：“世之读者，犹得于国学衰微之日，获见数百年久经沈蕤之典籍，相与探本而寻源，不至为俗本所眩瞶，诘不幸欤！”惟其如此，当这些古籍丛书相继刊成后，张元济对那些“网络珍籍，不吝通假”的藏书机构和“各出所储，以相匡助”的私人藏家表示衷心感谢，还特别提到：“亦有海外儒林，素富藏弃，同时发篋，远道置邮，使此九仞之山，未亏一篑。”他并引《诗经》中的诗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表达最深挚的谢意。<sup>⑤</sup>

在近代中日书籍交流史上，经常发生一种耐人寻味的吊诡现象。譬如，1884年，杨守敬将大量汉籍从日本舶载西归，曾在日本引发了一场议论风潮；而当韶宋楼被日本收购时，中国众多的学人更是个个捶胸

① 张元济：《残宋本〈中庸说〉跋》，《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第931页。

② 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增订本），第95页。

③ 张元济：《宋黄善夫刻本〈史记〉跋》，《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第988页。

④ 张元济：《宋刻本〈新唐书〉跋》，《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第1027页。

⑤ 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后序》，《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第985—986页。

顿足，激愤不已！1907年，诵芬室刊刻日本岛田翰的《皕宋楼藏书源流考》，董康为该书撰“题识”，甚至说：“古芬未坠，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亦长守古都也。<sup>①</sup>”针对这些议论和感慨，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在《中国书籍记事》一书中评论道：“如若中日双方互换立场，想必我们也会发此感慨，这种心情不是不能体会的。两国学者向来喜欢比较这两件大事，对其得失讨论不休。然而，与其论其得失，我更愿意立足于大局来看，把目光投向它们对日中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这一点上，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sup>②</sup>”我以为，张元济的日本访书，也应作如是观。

（责任编辑：张洪彬）

---

① 董康：《刻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题识》，《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② 神田喜一郎：《中国书籍记事》，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1页。

## Zhang Yuanji's Search for Ancient Chinese Books in Japan and the Restore of National Memory

ZHOU Wu

**Abstract:** In 1928, Zhang Yuanji spent one and a half months in Japan searching for the Chinese ancient books. He visited the public and private libraries in Tokyo and Kyoto, and, unprecedentedly, saw many valuable books, while the process of photocopying was complicated, and number of titles of successful borrowing, which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gorgeous event in Sino-Japan cultural exchange. By his sufficient preparation, his arduous work in deciding, borrowing, photocopying and negotiating, and with the help of many friendly sinologists in Japan, he has achieved a great succes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he borrowed and photocopyied 61 titles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of rare copy, and most titles among which were “long-time lost in China proper”. Later, these rare books were edited into Zhang's big sets of ancient classics series, so that these rare books which had dispersed overseas for several hundred years could re-emerge in their homeland, and merged again in the history and memory of Chinese nationality. In this case, the event is so significant, not only for the value of edition, but also, more importantly, for its relationship to restoring the national memory and re-constructing our national spirit.

**Key words:** Zhang Yuanji, searching ancient books in Japan, cultural memory